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及其评价

王 美 玉

摘 要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依据知识分子思想、心态基本状况对其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政策，初衷是使知识分子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但在随后几次的唯心主义思想批判运动中却走向了“左”的一面，这是一个不能不总结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 建国初期 中国共产党 知识分子 政策

作者王美玉，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29）。

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身兼学术与政治双重角色，这决定了历代政权的知识分子政策必将影响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本文试通过对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状况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回顾反思，以厘清建国初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及其时代效果。

一、建国之初知识分子的基本状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据不完全统计，如果按受过中等教育的学历推算，中国的知识分子大约有400余万，如果按大专文化程度划分，约有20~30万，其中高级知识分子仅为10万人，占4.5亿人口的比例极低。其构成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来自根据地、解放区以及革命军队中的知识分子。这部分知识分子在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被称为革命知识分子。他们人数不多，建国后大多成为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二是解放前夕毕业和在校的青年学生，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但他们怀有一颗爱国之心，革命热情高，可塑性强；三是解放战争中接收的国民党留下来的大量宣传、教育机构，各类学校、厂矿企业和各种文化艺术团体中的知识分子。他们当中有些由于或多或少地受过革命思想影响，所以新中国成立后能较快地适应并融入了新时代，有些则怀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情感，也有一些对执政党和新政府在政治上还存在着一些疑虑。也因此，在社会变革面前，其心态是不同的。

一类是完全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他们从自己的亲身感受中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高效廉洁作风。如：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的当天发表了《新华颂》：“人民专政，民主集中。/光明磊落，领袖雍容。/江河洋海流新颂，/昆仑长耸最高峰。/多种族，如弟兄，/千秋

万岁颂东风。”^①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在上海解放的第二天日记中写道“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今日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②由上海赴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著名剧作家顾仲彝，仅经过上海解放后一个多月的观察，就得出结论“中共各级干部们，给我不可磨灭的印象是热情诚恳，吃苦耐劳，谦虚坦白，坚定乐观。他们穿不大合身的军装，长头发，满腮胡子，大的用草绳缚住的破布鞋，起先给我一种很奇怪而不舒服的感觉，但看惯了，反倒使我油然起敬，肃然羡慕。”^③

一类是抱着“不问政治”的超然姿态，以平静的心态迎接政权的更替，他们中大多是学有专长的技术人员或自然科学家。如：著名哲学家、时为清华大学教授的冯友兰，在他看来“无论什么党派掌权，只要它能把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④直到1953年12月，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收到邀请他去北京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时，竟然还提出“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并表示“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⑤由此可见，在当时的一些学者心目中，学术与政治是绝然分开的。

一类是从惶恐、怀疑、茫然、观望到逐步认同、接受和信任的心态。他们当中的多数人要等一等，看一看。冯友兰在“文革”中进行自我检讨时说到自己在建国之初对共产党的态度存在观望和犹豫“我认为我是中国人，人民政府是中国政府，我当然服从，但我不是共产党员，党与我没有直接联系。”因此他在解放以后的几个月中，“一直没有公开表态，说我拥护共产党，毛主席。”^⑥但当中国的面貌迅速改变时，这些人便对党和政府发

出由衷的赞叹 “一年之中，真所谓百废俱兴，一切应该做的工作，政府都在尽量去做，一切不合理的现象都在努力革除。”^⑦

还有一类是冲破阻挠，历尽艰险，从海外回国的学者和学生。1950年2月，华罗庚在回国途中发出《致中国全体留学生的公开信》：“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⑧。科学家钱学森因决心回国投身祖国的建设事业而受到美国政府迫害，周恩来用提前释放美国15名战俘为条件交换钱学森等回国。地质学家李四光、物理学家赵忠尧、汪德昭 and 著名作家老舍、“两弹”元勋邓稼先、医学家吴阶平等都是在建国初期回国的。从1949年8月至1953年11月间，从西方国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就有1536人^⑨。他们不仅带回了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他们的政治态度。

总体上，当时的知识分子心态是复杂的，其中大部分属于自由知识分子阵营，这些人成为新中国建立之初知识分子的主体，也是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目标人群。

二、“团结、教育、改造”方针的确定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即对知识分子现状进行了正确分析。周恩来说：“我国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在过去虽然受了帝国主义和反动阶级的种种影响，但是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同时也受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压迫，因而一部分参加了革命，一部分同情革命，多数对于革命抱着中立的观望态度，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⑩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当然，也有部分知识分子存在着种种消极思想，所以，毛泽东强调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⑪

准确定位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这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前提和基础。虽然我们党的文件在30年代就有对知识分子属于劳动阶级的描述，但总的来说，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仍定位在“小资产阶级”上。1948年8月，陈云在为东北局起草的决定中指出：“企业内有大量体力劳动的工人，也有很多脑力劳动的职员。工人和职员，同是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的雇佣劳动者。”^⑫1949年4月25日，刘少奇在天津市委召开的国营企业职工大会上指

出：“职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无产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国家依靠工人，同时也依靠职员，特别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⑬第二天，他在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职员是工人阶级时，更是把大学教授，新闻记者等靠薪金收入生活的，都叫做雇佣劳动者。^⑭1949年7月23日，周恩来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也说：“工人和职员都是工人阶级，他们有的是处在管理地位，有的是直接生产的体力劳动者，但只是分工不同，没有阶级的对立。”^⑮到1950年8月，政务院颁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更是明确规定：“知识分子不应该看做一种阶级成分。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依其家庭成分决定。其本人的阶级成分，依本人取得的生活来源的方法决定”。政务院补充决定规定：“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⑯。可见，当时，已经以中央重要文件的形式确认识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工人阶级。

那么，何谓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呢？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概由于如下原因：一是对知识分子而言，面对社会变革，需要有一个由旧社会到新社会的适应过程，由为旧中国服务向为新中国服务的转变过程；二是从党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初衷看，是希望知识分子从人生观、世界观的高度来一个迅速转变，树立起无产阶级的立场；三是当时试图扭转社会上普遍的看法，即依据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政治立场，把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列入小资产阶级范畴；四是中国共产党依据在延安时期改造知识分子的成功经验，即通过“团结、教育、改造”一系列政策，以纠正知识分子的消极心态。今天看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的理念没有在党内和全社会形成普遍共识。

这一切成为中国共产党确立“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基本依据。首先，通过开办各种训练班、革命大学，招收知识分子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理论及党的方针政策。其次，号召知识分子投身于各种社会改革改造运动。第三，从1951年秋开始，中央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国知识分子中开展一场改造思想的学习运动，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场思想改造运动到1952年秋基本结束时，全国高校教职员的91%，大学生的80%，中学教师的75%参加了学习。这次运动帮助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为他们最

终形成无产阶级世界观，树立工人阶级思想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欣喜地把它看作“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⑦但是也存在着要求过高、过急，做法简单粗暴的问题，从而在部分知识分子心中长期投下“被改造”的阴影。

三、唯心主义思想批判运动的深化

如果说“团结、教育、改造”的思想改造运动还只是从宏观的角度简单清理了知识分子的阶级立场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对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就是延伸到各自的研究领域，深挖唯心主义思想根源的连续批判运动了。

早在1951年上半年，思想文化领域就电影《武训传》展开了一场批判运动。毛泽东认为：“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⑧由此掀起了建国后思想文化领域的第一次批判运动。虽然毛泽东初衷是希望通过这场批判和讨论，学习如何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人物和中国近代历史，但它却在客观上开启了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争论的恶劣先例。

1954年10月，开始了以清除胡适派思想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残余、建立马克思主义在各学术领域指导地位的学术批判。1955年2月，中央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讲演工作的通知》。当时中央认为“在学术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是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集中化了的表現。”^⑨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乃至“胡风反党集团”的批判则将思想改造问题上升到敌我矛盾的高度加以斗争，受牵连的知识分子达2100多名。

思想批判运动有助于知识分子确立学术研究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但是这些批判也存在着明显的消极作用。一是把学术研究中的不同意见同建国初期的阶级斗争背景相联系，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二是试图通过群众运动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结果违背了知识分子的成长规律，只能适得其反；三是在运动中存在着不加分析地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倾向。而文化和学术思想的价值，往往不是简单地用对与错来衡量的。列宁说过“聪明的唯心主义者比愚蠢的唯物主义者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⑩；四是以世界观为依据确定阶级属性，这既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界限，也影响到了知识分子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

建国初期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本来“团结”是基础，“教育和改造”是手段和方法，目的是发

挥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由于没有形成“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共识，结果使思想改造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党的政策初衷，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历史教训！

注释：

① 郭沫若 《新华颂》，《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日。

② 《竺可桢日记》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6页。

③ 顾仲彝 《到解放区后我学习到了什么》，《光明日报》1949年7月2日。

④ 冯友兰 《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24-126页。

⑤ 陆键东 《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12页。

⑥ 蔡仲德 《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9页。

⑦ 徐悲鸿 《一年来的感想》，《光明日报》1950年10月1日。

⑧ 《华罗庚诗文选》，中央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

⑨ 金冲及 《周恩来传》第3卷，中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2-1193页。

⑩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页。

⑪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⑫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2页。

⑬ 《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41页。

⑭ 《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00页。

⑮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4页。

⑯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97-399页。

⑰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9页。

⑱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16页。

⑲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⑳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05页。

[责任编辑：赵宏]